

9 媚川瑞彩

合浦在以珠池形成了产业圈效应，以珠市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圈效应，以汉墓出土文物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集聚考证效应的同时，也以其丰富的资源优势，鲜明的风物特产，精彩的历史人文，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留下精彩华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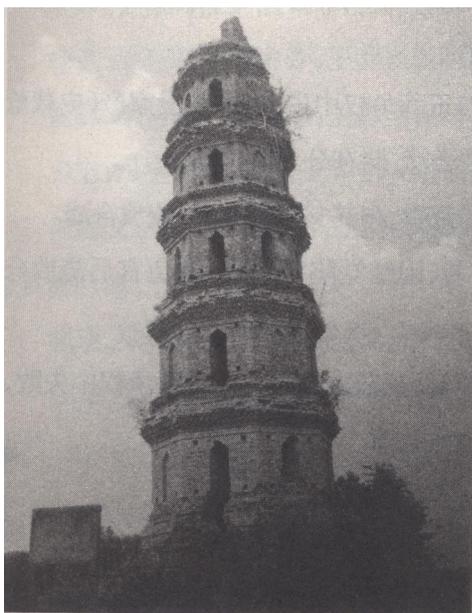


图 9-1

建于明代的顺塔，立于南流江边。

两汉之交，王莽专权，大批的朝廷官员被贬斥，这些被贬斥的朝廷高官，皇亲国戚多有被贬徙合浦安置，合浦因此成为官员贬徙的集中地。根据史籍的不完全统计，汉代贬徙合浦的官员中，有皇后 1 名，国丈 2 名，封侯者 12 名，驸马都尉 1 名，尚书、京兆尹至太守以上高级官员 8 名，郡功曹、黄门郎、郎中令各 1 名，还有 1 人是篡汉建立新朝称帝的王莽之子的大舅父。

造成如此众多的高级朝官贬徙合浦的原因有三：朝廷内部帝后党之争，

排斥异己；权力倾轧中奸臣得势，忠良被陷害；王莽篡汉前后为建立个人势力而弄权逐臣。

这贬徙官员流放合浦的漩涡起于汉成帝绥和二年（前24年），计有：

王章，因忠直敢言，奏陈宠臣王凤专权，被王凤陷害入狱，严刑至死，妻子徙合浦。时在公元前24年。

淳于长，汉成帝时宠臣，封定陵侯。时称“贵倾公卿”，因与王莽有矛盾，以谋立左皇后大逆致死狱中，妻子徙合浦。时在公元前8年。

傅晏，大司马、封孔乡侯，哀帝傅皇后之父，在与王莽争权中失败，全家流放合浦。时在公元前1年。

董恭，哀帝时封关内侯，在与王莽争权中失败，被抄没家产（史载董氏家财四十三万万）后，全家流徙合浦，时在公元前1年。

董宽信，董恭之子，时任驸马都尉，与其父同时被贬，流放合浦。

赵昌，哀帝时河内太守、尚书、因结党陷害忠良，被免官后流放合浦。

董贤，哀帝时封高安侯，大司马，董恭之子。在与王莽争权中失败，被贬合浦，董贤夫妇自杀，其家属徙合浦。

孙宠，哀帝时封方阳侯，因与宠臣结党造作奸谋，陷害大臣，免官流徙合浦。时在公元前1年。

右师谭，哀帝时封关内侯，与孙宠结党作奸，同时免官徙合浦。

息夫躬，哀帝时封宜陵侯，因结党作奸，被斩于市，其妻子徙合浦。

丁明，汉平帝时封安阳安侯，大司马，后贬官徙合浦。

吕宽，汉平帝时参与王莽争权之斗，被流放合浦，王莽当权后，获赦并与王莽结成宗舅之亲。

张由，哀帝时封关内侯，因陷害大臣流放合浦。

杜业，哀帝时封建平侯，王莽当权后，对杜业的言论不满，免官流放合浦。

史立，平帝时任太仆，王莽当权时官流放合浦。

丁言：平帝时任泰山太守，王莽当权时免官流放合浦。

冷褒，平帝时任郎中令，王莽当权时排除异己，被免官徙合浦。

段犹，平帝时任黄门郎，王莽当权时排除异己，被免官徙合浦。

卫宝，汉平帝时国丈，王莽当权时被排斥贬徙合浦。

卫姬，汉平帝为平帝后，王莽弄权尽诛卫氏支属，将卫皇后免去后位贬徙合浦。

郭璜，东汉和帝时为长乐少府，因株连案被杀，家属徙合浦。

郭举，郭璜之子，时为侍中兼射声校尉，因株连案被杀，家属徙合浦。

桓晔，东汉献帝时任郡功曹，为当时名士，因被陷害死于合浦狱中。

尚有一些官员被降免职后流落合浦的，但这些官员宁愿自杀也不肯到合浦。如东汉时的邳寿，为官清廉刚正有好名声，由举孝廉升至刺史，尚书令，京兆尹，任至尚书仆射。因不肯附和权贵枉法被诬陷入狱欲置死，后得同僚营救改流放合浦，邳寿出狱后自杀而不愿做流放之臣。

以上这些都是太守以上职级的朝廷官员，除个别外，食禄都在二千石以上，相当后世的三品官阶。他们流放、迁徙合浦，必然对合浦的社会形态产生相应的影响。他们之中，极个别有机会重返中原之外（如吕宽依附王莽），绝大部分只能魂断珠乡，在这个意义上说，也为合浦境内 8500 多座汉墓群的形成，及其间出土的珍贵文物所揭示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内涵留

下了很具说服力的注脚，更为合浦汉墓的考古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这些被安置在合浦的朝廷高官及其亲属在合浦居住期间，对合浦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过推动作用。王章妻子在合浦经营珍珠生意，致产数百万，平反后回到故乡赎回被官府罚没的家产田亩，此事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合浦物产和区域的知名度，也在合浦留下许多精彩的人文史迹。如董恭被贬斥合浦时，留下了“董公山”的传说。中山王太后被贬合浦安置时，在合浦留下了皇后山、皇后村的名称。

西汉元始年间（1-5年），王莽专权，把持朝政，排斥异己，一口气连贬了四位皇后、皇太后，推出年仅九岁的刘衍登基，即汉平帝。平帝登基后不能亲政，由太皇太后临朝，王莽以首辅自居，也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导演一出篡位乱政的闹剧，汉平帝的生母中山王太后被贬徙合浦就是其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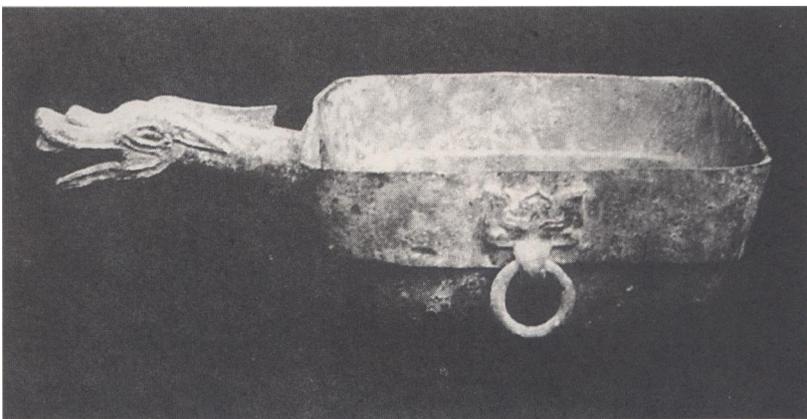


图 9-2

合浦汉墓出土的龙首形铜灶，可见证了墓葬主人的身份。

汉元帝刘奭在位十六年，共有三子，刘康、刘骘、刘兴。刘康为傅昭仪所生，封定陶王。刘骘为皇后王氏所生，立为太子。刘兴为冯昭仪所生，封中山王。元帝死后，刘骘继位是为汉成帝。汉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却没有

子嗣，只好过继刘康的儿子刘欣为太子，汉成帝死后，刘欣继位是为汉哀帝，汉哀帝在位六年即死，又是没有子嗣，于是将中山王刘兴的儿子刘箕子过继为太子，改名刘衍，即位为汉平帝。

汉平帝登基后，生母卫姬本应母凭子贵，封后享福；但王莽一手把持朝政，怕卫姬入宫封后会削弱自己的权势，于是只按平帝未过继为太子时的中山王王位册封卫姬为中山孝王后，又将卫姬的两兄弟封为关内侯，只准在中山居留不得进京。此举引起了朝中忠直大臣的反对，不少大臣联名上书，要求按汉例册封卫姬为皇太后，并迎进宫与平帝母子相聚，以尽孝慈。众大臣此举反而加重了王莽对卫姬的猜疑和妒忌，加剧王莽对卫姬的限制和逼害。

把卫姬引上贬徙之路的不是别人，正是王莽的长子王宇，而王宇则是好心做了坏事。

王宇见平帝即位后，卫姬仍被王莽排斥在外不得册封为太后，且被逼母子分离，对这些不近情理的做法，王宇也时有劝说乃父。王宇也有顾虑，担心平帝长大后必有怨恨，到时将会留有后患，与其日后遗祸，倒不如早有筹谋，及时化解这些恩怨，也算是为王氏一族预留后路。主意打定，王宇就将想法向老师吴章、大舅吕宽提出，以期共谋良策。

吴章在当时是个很有名望的人物，虽然只是一个博士的官职，但门下的生徒逾千。吴章深知王莽不是一个可理喻的人，却又非常迷信鬼神，只有用迷信的方法，才能使王莽改变行为，便定出一计，叫吕宽深夜将狗血倒在王莽的门口，以天降警兆来说服王莽。谁知吕宽深夜前往王莽门口倒狗血时，正逢王莽为准备嫁女上下忙碌而通宵达旦，吕宽来到门口倒完狗

血就被发现了，当即被扭送王莽处严刑逼问幕后主使，吕宽原以为王宇是王莽的长子，直说或可免一死罪，就把王宇主谋之事供了出来。岂料王莽已权欲遮眼，六亲不认了，不但把王宇、吴章、吕宽3人一并处死，就连已经怀孕了的儿媳吕马也不放过，关在狱中待生下小孩后也予处死。

王莽杀死了自己的长子、儿媳后犹不解恨，又以串谋造反之名，将卫姬家族人等全部诛杀，只因碍于平帝在位而不便诛杀卫姬。对此，王莽大不甘心，借机将昔日对自己有意见的文武官员一概都以与卫氏通谋的罪名处死，自公主、王侯至太守以上官员因此丧生者15人。甚至王莽的叔父红阳侯王立、堂弟平阿侯王仁、乐昌侯王安因平日与王莽貌合神离，也在此案中遭牵连被杀。不久，王莽更是以铲除乱党，维护朝廷安定为借口，假传圣旨（时由太皇太后王氏临朝）免去卫姬中山王太后的封号，贬徙合浦。

卫姬贬徙合浦的第二年，王莽使用毒酒害死了汉平帝，自己当起了皇帝，卫姬在合浦的遭遇再也无人提起。

王莽在把持朝政的过程中打击异己，培植个人势力以达控制朝政目的。他以定国公身份把持朝政，建立了新莽政权（9—23年），却因更改汉朝年号，而背上了“篡汉窃国”的千古骂名，后世一直视之为一个大奸大恶大邪大毒的权臣。其实，王莽也是一个有作为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在对外开放方面有着独特见识，这从他对合浦采取的施政措施中，可见一二。王莽当政之初，就敏锐地认识到合浦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下令把“合浦郡”改为“桓合郡”。“桓”在古汉语中有“大”的含义，由此可见王莽对汉代合浦的认识和了解并不局限于“众水汇合人海之处”的释义。《汉书·地理志》为此专在“合浦郡”条目中注释：“合浦郡，汉武元鼎六年开，莽曰桓合，

属交州。”

王莽当政，对合浦抱看重之意并不只在于对地理区位“大”（桓）的认识上，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高合浦的知名度，其中之一就是把京中犯事的重臣贬往合浦，通过这些京都重臣的贬徙加强对合浦的管治。王莽在朝控制了汉哀帝、汉平帝、汉孺子婴3个皇帝秉政用事，史称为“专权篡汉”时期。期间，他先后将一大批贵族王侯，甚至是皇亲国戚贬斥来合浦安置，其中包括哀帝皇后丁氏一族、平帝国舅卫宝、中山王后卫姬，国丈傅晏、尚书令赵昌、定陵侯淳于长、御史董恭、高昌侯董宏等。大批官员及皇亲国戚来到合浦之后，不但带来了京城和中原的经济、文化信息，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合浦社会经济的发展。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自汉武帝元封年间（前110-前105年）以合浦为始发港开通以来，都是由“中国往商者”自由贸易致富，缺乏严格的管理，没有建立对口管理机制，“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繒而往”。这种贸易行为大都是含有礼尚往来的献见形态，因为当时从“合浦船行”至东南亚及印度（黄支国）一带，往返要数年之期，路途上“苦逢风波溺死”。加上汉武帝时汉王朝国力强盛，威震四海，此前又有文、景（帝）之治作基础，海上丝绸之路的纯商业作用还不是十分突出。

“平帝元始中（1-5年），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国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至皮宗。船行可二月，至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不程国，汉之译使自此矣。”这是《汉书·地理志》中一段非常重要的记录，可以视作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由纯商业性运作向多

元化运作，由民间会同官方经营向官方控制经营的转折点。

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合浦的珍珠产品成为朝廷指定的贡品的同时，合浦郡的其他珍稀物品和美食也向中原朝廷进贡和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海外传递。如合浦荔枝、龙眼汉朝时已作贡品。提起荔枝，人们当会想起唐朝杰出的大诗人杜牧的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因为这首《过华清宫三绝句》之一的“吟荔枝”，岭南荔枝自此后便多了一个新品种“妃子笑”。杜牧后约150年，又一位惊世骇俗的人物吟唱：“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此公来到合浦廉州，品尝了廉州龙眼之后，惊叹“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枝”，感慨“蛮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污”以自喻，此君便是宋朝礼部尚书龙图阁大学士苏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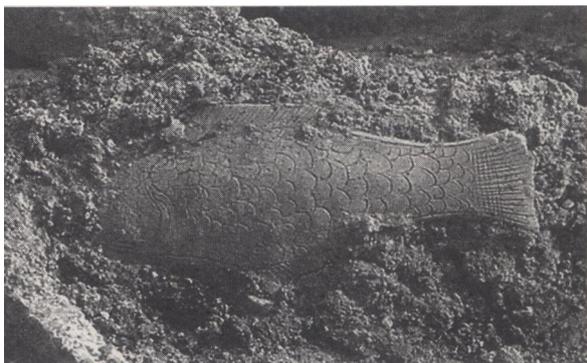


图 9-3

合浦汉墓出土的玉鱼。

合浦古属岭南，古人笔下吟唱的岭南佳果传奇，合浦自然也属其中，而且年代上溯久远，早在汉朝就作为贡品，记于史籍。

据《后汉书·孝和帝纪》：“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这是最早描述岭南荔枝、龙眼进贡京城旅途状况。时在汉永元年间(88年)。“旧南海”是岭南三郡的泛指。秦始皇平定百越，以百越之地设南海、桂林、象郡，即后世所称的岭南三郡。秦始皇

设郡后，仅置南海一尉来代管三郡，多以“东南一尉”或“南海一尉”来代称岭南三郡政事。合浦处象郡与南海郡交界之间，属象郡辖，当然也是“旧南海”进贡荔枝、龙眼的区域。

永元十五年（103年），与南海交界的临武长（汉时，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万户以下的县设长）唐羌上书朝廷，向皇帝陈述了南海传送荔枝、龙眼的艰险及劳民伤财状况，引起了皇帝刘肇的关注，于是下诏曰：“远国珍羞（“羞”通“馐”），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受献。”由于皇帝的反省，下诏终止，进贡荔枝、龙眼，“由是遂省焉”。

合浦汉朝就进贡荔枝、龙眼，在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也有记述：岭南旧献生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昼夜传送。监武长汝南唐羌上书曰：“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伏见交趾七郡献生龙眼等，鸟惊风发。南州土地炎热，恶虫猛兽，不绝于路。至于触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爱献。”

这里所指的“交趾七郡”，即是汉武平定南越王之后，将其属地岭南三郡划置九郡中的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时属交州的珠崖、儋耳，时有撤立，后从交州划出）。此外，全国共设十三部作为、监察机构，交趾部是十三部之一，因此交趾七郡亦即交州七郡。合浦居中，是交趾，九真，日南到中原的必经之路，更是向朝廷进贡荔枝、龙眼等特产首选的启运和生产地。

合浦郡辖地广阔，东西至今钦州、防城，北包括浦北、灵山、横县、玉林、邕宁一部，东到雷州半岛、阳江一部，南曾包括朱崖、儋耳（今海

南琼山、儋县)，物产丰富，又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所在地，因此成为上下四府的物流中心，太官（太守）向朝廷“献膳为功”，是不会舍近求远另觅他方的。更重要的是，合浦自古就是荔枝、龙眼的主产地，如有名的鸡嘴荔枝早在明朝就引入种植了。

曹操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在许多地方都有传奇故事和人文典故，如洛阳的五色棒、观沧海的碣石诗、大乔小乔的铜雀台等。曹操品尝过合浦的粽子，也是史料记载中的一段佳话。据《南方草木状》记载：“益智子，出交趾合浦。建安八年（203年），交州刺史张津尝以益智子粽饷魏武帝。”魏武帝就是曹操。“饷”，就是用美食来款待贵宾，交州刺史张津把以合浦益智子制作的粽子当作美食来款待曹操。这里，涉及曹操曾品尝合浦粽子3个人物中，一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汉献帝丞相曹操，一个是交州刺史张津，一个是广州太守嵇含，都是真实历史人物。

建安八年（203年），时曹操以汉献帝丞相之尊为争夺天下而忙于战冀州，征刘表，忙里偷闲还举办过一场颇被时人议论的婚礼，他肯定是没有空闲为品尝粽子而到合浦一游，而是“交州刺史张津尝以益智子粽饷魏武帝”。张津是交州刺史，又怎么会牵扯到合浦益智子粽来呢？原来，根据汉代的行政区域设置，分天下为十三部州，每部州设刺史，部州下领郡国共103个，交州刺史部领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之郡，时尚没有广州。广州是三国黄武五年（226年），孙权分合浦以北设广州才有名的。张津作为十三部州之一的地方行政长官，要见曹操并不是难事。何况合浦的益智子有健脾益胃的作用，且又芳香沁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也称益智子有“主治冷气腹痛及心气不足，梦泄赤浊”的功用，可与

龙眼功效相同。而在史书记载中，曹操也曾有“冷气腹痛及心气不足”之症。张津把具有食疗作用的合浦益智子制作的粽子“饷”曹操，是很正常的，何况张津又是朝中权贵的亲戚！



图 9-4

建于晋代的“三廉古刹”东山寺，许多达官显贵显贬臣如苏东坡、冯子林等都在其中留下踪迹。

合浦等地是壮族先民聚居的区域，早在东汉时期就开始用益智子与糯米混在一起包粽子。至今，合浦的客家人还有用益智子和吉萋叶一起包糯米粽的习惯。作为一种集食疗于一体的地方特色食品，合浦的益智子粽与合浦珍珠、合浦荔枝、合浦龙眼，一起成为当时时尚的送礼佳品而列入文献记载之中。

三国时期，虽然魏、蜀、吴三国逐鹿，天下纷争不断，合浦也曾一度处于魏、吴相争的拉锯地带，时有战争，但孙权刻意扩展海上丝绸之路，多次派出大规模的船队航海，对合浦产生深远的影响。

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乘两年前赤壁之战（建安十三年）

的余威，又得到总督七郡的交趾太守士燮及其三个弟弟的依附（士燮的三个弟弟当时分别担任合浦太守、九真太守、南海太守），一举攻占岭南。这就是史书所称的“由是岭南始服属于权”（《资治通鉴》卷六六）。合浦此时已纳入孙权的势力范围，属于东吴辖地。从这时候起至孙权的孙子孙皓投降晋武帝司马炎止，刚好70年，这70年间，是汉武帝设合浦郡321年后，行政区域开始分化的重要时期。孙权占据岭南之后，对士燮兄弟优厚有加，不但对士燮加封左将军、卫将军、龙编侯，还任士燮的儿子为武昌太守，士燮的弟弟士壹不但留任合浦太守，还加封中郎将，偏将军，都乡侯，使得士燮兄弟更加卖力为孙权效劳。据《三国志·吴书》记载：“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琉璃、翡翠、玳瑁、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壹时贡马数百匹。权辄为书，厚加宠赐，以答慰之。”从这段记述中可知士燮与孙权的关系很密切。而时任合浦太守的士壹也经常向孙权进贡马匹。士燮及士壹等保持原有的地位与权势，直至士燮90岁去世，时在黄武五年（226年）。

士燮去世后，“权以交趾县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趾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又遣陈时代燮为交趾太守”（《三国志·吴书》）。这样一来，实际上全部削弱了士燮家族的势力，引起了士燮之子士微的不满。士微就自己署为交趾太守，带领家丁族兵，拦截戴良，不让戴良上任。而这时戴良与广州刺史吕岱都已同时到达合浦，却无法按期上任。吕岱只好赶到广州，连夜发兵从海上出发到合浦与戴良会合，共同进攻交趾，不但杀了士微，还将士壹父子共六人诱杀。这是合浦归属东吴后的第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一个在岭南经营了40多年的士宦望族灭亡了；广州的

设置也被撤销，合浦郡又恢复了原来的辖地。



图 9-5

合浦客家做社场景，这是随中原移民而来的民俗之一。

黄武七年（228 年），孙权将合浦改为珠官郡，这次合浦改名的时间虽然很短，到孙亮执政改回合浦郡，再次划合浦以北为广州，期间不到 30 年，但这是合浦设郡后的第一次更名。孙亮在 258 年被孙休夺位，孙休去世，孙权的孙子 23 岁的孙皓继位，改年号为元兴。而在上一年，交趾守将叛吴投魏。交趾成为曹魏的属地。汉蜀后主刘禅投降了曹魏，汉蜀灭亡。合浦成为孙吴与司马炎相争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此间，连续发生了几次战事。

宝鼎三年（268 年），孙皓派交州刺史刘俊率军向交趾发起了三次进攻，要收回时属晋武帝司马炎的交趾（曹魏政权于 265 年灭亡归晋），但由于郁林太守、九真太守都依附于交趾太守杨稷，刘俊不但无法收复交趾，杨稷甚至派出军队围攻合浦，在古城开展激战，刘俊战死，剩下的军队只好退守合浦城。孙皓这次收复交趾之战，虽然失败了，但他并没有失去信心，启用一批能干的老臣及其有才干的少壮派，其中包括原合浦太守薛琮的儿

子薛莹等为之出谋献策，积极备战，并召集了威南将军薛羽、苍梧太守陶璜，监军李勣，督军徐存等汇集合浦，先后于建衡元年(269年)、建衡三年(271年)从广州、交趾向司马炎的军队发起攻击，最后收复了交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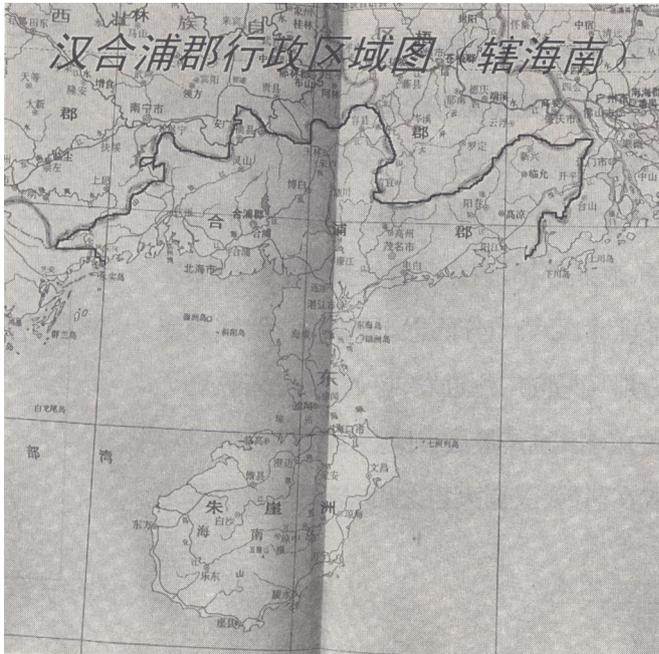


图 9-6

汉合浦郡行政区域图。

天纪三年(279年)夏天，合浦太守修允(时已调任桂林太守)的部下郭马造反。郭马率军一路追杀，攻入广州，自命都督，号称都督交州、广州军事，并继续攻占苍梧、始兴等地，形势十分危急。孙皓命交趾牧陶璜收复合浦后，率领合浦、玉林诸郡兵马向广州进发，打败了郭马，收复了广州。这是孙吴政权大获全胜的一仗，也是最后一仗。天纪四年(280年)三月，孙皓战败投降，孙吴政权在曹魏，汉蜀灭亡之后，与司马炎西晋王朝继续对抗了16年，是三国之中存在时间最长的政权。晋灭吴后，撤销了珠崖，并入合浦郡。斯时，合浦郡除了辖珠崖(今海南省)，还辖六县：合浦、南平、荡昌、徐闻、毒质、珠官(今徐闻一带)。六县的区域面积相当

于今天的徐闻、海康、湛江、遂溪、廉江、博白、容县、玉林、灵山、浦北、钦州、防城、北海、横县（吴为合浦北部都尉，晋为宁浦属县）。

孙权治理岭南时期，还有一件重大决策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即以合浦为界划分了交、广二州。

广州相隔合浦千里之外，两地本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但是，历史的缘分却很亲近。最早搭起这条“缘”之桥的，就是有“中原客家南迁第一人”的南越王赵佗。

公元前 204 年，南海郡龙川令赵佗趁秦末战乱兵祸之际，起兵兼并了秦岭南三郡（南海、象郡、桂林），建立了南越王国，自立为武王，建都于番禺（即今广州市）。蜀国王子也派出军队侵入了时属南越王国区域的合浦。合浦此时虽然没有独立设郡，但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特别是灵渠凿通，连接了南流江（时称瘴江）出海黄金水道之后，控制了合浦就等于控制了岭南西部。赵佗当然明白这是个要害之处，于是亲率大军西征，到合浦设立了行宫作指挥部。当年赵佗的兵马有多少？缺乏具体的数字记录，据《太平寰宇记》、《元和郡县志》、《读史方輿纪要》等史籍记述中称，赵佗在合浦屯兵时，舂谷取米所剩的糠头堆积成山，合浦的糠头山就是因此得名的。赵佗很快就把蜀国王子的军队打败了。赵佗的王宫在番禺（今广州市区内），行宫在合浦，东西两宫，秦汉结缘。后来，南越王赵佗的王宫在战火中毁坏甄没了，后人挖掘时发现了王城遗址，在遗址上建立了南越王宫博物馆。他留在合浦的行宫后人改为灵觉寺，即今合浦东山寺，成为两广最早的两间晋代寺庙。



图 9-7

在明代书院旧址上于清初重建的海门书院和魁星楼。

到了三国时期，东吴政权的孙权与曹魏政权的曹操为争夺合浦的控制权，打来打去，难分胜负，黄武五年（226年），暂时占有合浦的孙权“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交趾以南为交州”。这次划分虽然时间短暂便“俄复旧”，但自此后有了“广州”的名称。黄武七年（228年），孙权又把合浦改作珠官郡，取消了广州。永安六年（263年），时属东吴政权范围的交趾郡叛吴投魏，第二年，东吴景帝孙休把持不住大局，又将合浦以北划出重设广州。这样就形成了东吴占有广州，曹魏占有交州，合浦夹在中间，时属广州，时属交州的轮换状态（三国承汉制，州辖郡）。宝鼎三年（268年），东吴末帝孙皓向叛吴的交趾郡发起进攻，此时，曹魏政权已灭亡，交州落入司马炎集团手中，国号为晋，司马炎自立为晋武帝。吴军不敌晋军，退回合浦备战。经过一年多的备战，于建衡元年（269年），吴军就从合浦出师击交趾，向晋军发起进攻，又失败，“退保合浦”。建衡三年（271年），吴军著名将领陶璜率部再次反击，经过了两次大的战役之后，夺回了交州。此时，交广两州均属吴政权所有，直至吴政权灭亡（280年）。从孙权黄武五年（226年）划合浦以北设广州到天纪四年（280年）的54年间，以合浦

为界划分的交广二州先后在东吴、曹魏、西晋间几分几合，但由此奠定了广州的设置并为后世所沿袭。

广州城市建设选址，也与合浦人文有关联。广州城能明确的选址，合浦名士姚文式功不可没。东吴据有广州时（时称番禺），名将步骛为交州刺史，合浦名士姚文式在步骛帐下担任幕僚。后来，步骛到达广州任职时，带领一帮部下巡视山川地形，面对广州的肥沃土地，步骛不禁感叹：“这真是建立都城的好地方啊！”并向众随从询问谁知道当年南越王赵佗的王宫故址，透露出想在南越王宫故址建州治都城的意思，当时众随从“人莫能知”。只有姚文式准确地指认出南越王宫的所在地：“在州城东北三十里，则陀宫近是矣。”姚文式还详细的列举了指认赵佗王宫的各种依据。步骛听了姚文式的介绍后，登上高处仔细眺望，并派人四出访寻老者隐贤，证实了赵佗王宫确实是在姚文式指认处，于是就下令勘探城址，“遂立城郭，以建州治”，在姚文式指认的地方建筑了一座州治所在的城池，这座城池就是广州城。《南越志》在记述这段历史插曲的时候称广州城能在赵佗王宫故址上建设，“文式之功也”。这就是合浦与广州城建的人文之缘。此后，随着广州建设的快速发展，到了南北朝之后，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中心地位逐渐移向广州，合浦与广州又多了一个海上丝绸之路之缘。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合浦沿海地区，曾先后发现了众多的汉代陶瓷窑址群。这些陶瓷窑址的文化遗存丰富。

合浦沿海汉代陶瓷窑遗址有：山口英罗村的三处，廉州老哥渡的二处，廉州镇草鞋村、窑上街的二处。这些汉代陶瓷窑址，大多在合浦沿海，特别是廉州老哥渡和廉州草鞋村、窑上街的汉陶瓷窑址群，则在汉代海上丝

绸之路的始发港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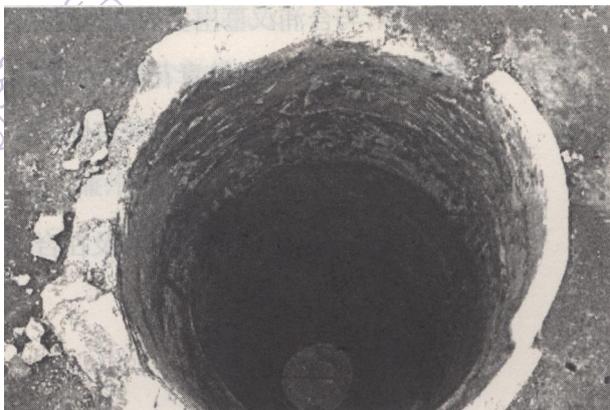


图 9-8

合浦汉窑遗址发现的水井。

合浦廉州镇草鞋村、窑上街的汉代陶瓷窑址群，位于廉州镇西南的草鞋村、窑上街（今属二街居委会），紧靠廉州江畔，距老哥渡汉代陶瓷窑址约四公里，距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六公里。据初步勘查发现，共有窑包八处，均未正式发掘。但从群众基建及公路建筑施工中出土的汉代陶瓷残片来看，遗址积淀是相当丰富的。在堆积层中有夹砂陶、彩陶残片，有青白瓷、白瓷残片，也有烧制时窑变的器物。在陶器中既有用金属刻划的线纹夹砂陶，也有彩绘鱼纹和水波纹的彩陶。在瓷器中有青花瓷、器物上绘径枝花纹和鱼纹图案。瓷质精良、瓷胎薄、彩绘精美。在窑址旁还出土有青黑色的绳纹汉砖和布纹汉瓦。

1956年，发现廉州老哥渡汉代陶瓷窑址二处。该遗址地处南流江最东的一条支流岸旁，距廉州城四公里、距合浦乾体港三公里。因窑包的部分堆积层被洪水冲塌，大量青白瓷、白瓷片及一完整的白瓷罐露出地面。经广东省博物馆鉴定，出土的瓷片和瓷罐均为东汉时的文物。“大跃进”年代大办水利时，老哥渡的汉陶瓷窑址被毁。

山口镇英罗村的汉陶瓷窑址三处，位于英罗港两侧。该遗址堆积丰厚，在窑址附近曾发现彩陶残片及白瓷残片多片，均为汉代之物。

荷兰一些考古学家曾在爪哇西部的万丹发掘出土一些陶瓷片及器物，这些陶瓷器物与合浦汉墓出土的陶瓷器及沿海出土的汉青白瓷、乌金陶器的风格、造型、图案极为相似。在苏门答腊出土的夹砂陶、白瓷与合浦汉陶瓷窑址出土的陶瓷器，无论在造型、彩绘或施釉配方上也都极为相似，与合浦汉墓出土的陶器更是基本一致。在西加曼丹的三发，曾发现一件东汉初径枝青花瓷罐，从彩绘和瓷质、造型来鉴定，该器物与1956年在廉州老哥渡汉陶瓷窑址的堆积层发现的器物 and 残片基本是相同的。

从外国出土的陶瓷器物及在合浦汉墓中出土众多的外国舶来品，及从合浦沿海发现为数不少的汉陶瓷窑址群的出土文物来分析，得知汉代合浦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后，合浦沿海的汉陶瓷窑所生产的产品大多是为出口服务的。合浦不但是丝绸和陶瓷的产地，也是集散地。

合浦郡境内的古窑址数量庞大，仅今合浦境内就有近三十处。汉代窑群遗址最著名的就是位于今合浦县城西南草鞋村内的汉窑群遗址。该汉窑群遗址于1989年发现。由十多个马蹄窑和多个馒头窑组成。位于穿越合浦县城的西门江入海口支流旁、与古海角亭相隔不远。在挖掘中发现有较厚的汉瓦堆积层及红陶堆积层，同时也发现有较多的汉砖、方格纺板瓦、公母瓦和陶瓷器皿等碎片。汉砖有纹饰。汉瓦朝天面有孔钉纹、背面有绳纹。板瓦厚约一厘米，胎质灰白或灰褐。汉窑遗址中还有筒瓦、筒瓦分大小头，小瓦头宽约十一厘米，印有直纹、斜纹。陶片有里衣方格纹、细网纹，具有明显的汉代风格，汉窑遗址中还出土了数种子陶罐。距汉窑遗址沿江不

远处，有倚江而建的廉州老街，街名为“缸瓦街”。“缸瓦”是合浦方言中对陶瓷产品的总称。至唐、宋年间，合浦的陶瓷业发展迅速，陶瓷产品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商品。除了陶瓷产品之外，合浦的造船业在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周边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图 9-9
汉窑遗址发掘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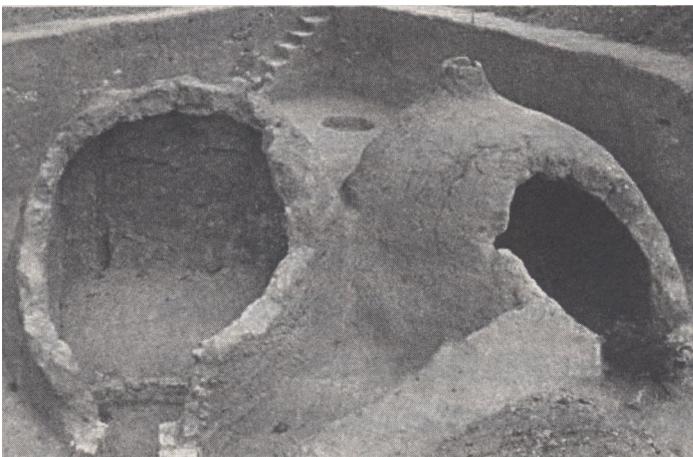


图 9-10
合浦汉窑群遗址发掘的双体窑。

《廉州府志》记述，清代同治年间，廉州府乾江的乡民在九头岭（原合浦县氮肥厂侧）一带挖土时，挖出了一批木板和方木，其中方木长达十丈。据考证，这些方木就是船的龙骨，此处应是一个造船厂的遗址。可惜

的是，当时的乡民觉得“置之无用”，于是又复泥土填之。《合浦县志》也记载，在乾江水儿（原合浦县造船厂）曾挖掘出战国时期的造船厂遗址。而在史料记述中，汉伏波大将军马援征伐交趾叛将时，曾在合浦驻军训练水师，为了使北方籍的兵士能适应风浪的起伏升腾，马援专门在南流江边建了一个造船厂，还专门造了一艘铜船供士兵训练用。铜船湖遗址就在今合浦石康镇。

秦汉之际，合浦沿海一带就有了船舶航运的记录。《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记载：秦始皇“又使尉（赵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秦始皇开通的这条运粮水道，后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水道，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北海、合浦的造船业发展。又如《史记·平准书》中记“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这里的“越”是指南越王国，合浦有南越王行宫，址在今东山寺。从《史记》的这句话中可看出，包括北海在内的“越地”，已经具备了造大船的技术和材料。南越王赵佗把行宫设在合浦，是便于指挥水师抗击入侵的蜀国军队。由此可见，北海、合浦一带战略地位的重要。至于书中记述的“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的楼船，是否也是在北海、合浦建造呢？《汉书·地理志》中有“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的海上丝路航线记录，但这些船从何而来？其中的“为蛮夷贾船”，说明当时已有外国商船来北海、合浦一带做生意。

到了东汉，合浦的造船业发展有了文字记录，《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是这样记述的：“十六年（光武帝十六年，40年），交趾女子徵侧及其妹徵贰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是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

光武乃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路、通障溪、储粮谷。”合浦等地经过了两年多的备战之后，“十八年（42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之众讨之”。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合浦当时主要的备战任务是“具车船”，其他地方是出人出力出粮草的。马援率师收复了合浦等地后，“又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将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徼侧余党”。这二千余艘楼船除小部分是经南流江水路而至合浦的之外，大部分是按光武帝的诏令在合浦沿海一带建造的，这是史书上最早关于合浦造船业的文字记录。

三国两晋年间，战乱纷争不断，割据局面并存，社会生产力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而此时合浦却出现了偏安局面，造船业的发展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主要原因是孙权占据合浦一带时间长，先后达60余年，为了扩张实力，在大力发展航海业的同时，也加强了采珠业的管理。《三国志·吴主传》记：黄武七年（228年）“是岁，改合浦为珠官郡”。把合浦改为珠官郡，由此可见孙权对采珠的重视，船只是采珠的主要工具，优先发展造船业成了势在必行的支柱产业。据史书记载，孙权曾一次组织了三百多艘船出海航行，以示威德，但中途因台风阻滞无功而返。孙权辖治岭南时，主要有两个出海口，一个是广州，一个是合浦，造船业的布局不外乎也在这两个地方。合浦既是海上珠池采珠的“珠城”，又是孙权与曹操争夺的军事重地。从宝鼎三年（268年）至建衡三年（271年）的四年间，东吴与曹魏发生了四次争夺战事，都是以合浦为大本营，其中从海路攻击的有两次，没有雄厚的造船力量作支持，是不可能进行如此频繁的大规模战争的。

南北朝时期，今北海市区内设置有盐田郡（见《壮族通史》上卷），到

了唐代又先后设置有珠池、罗城两县（见《旧唐书·地理》）。行政区域的设置，促进了北海造船业的加速发展。据《壮族科学技术史》一书记载，这时期合浦的造船业除了为捕鱼、采珠提供船只外，还造了大量的军用船艇。官府还征用这些船只去运送兵马粮草。这一时期的造船工艺中，应用了粘泥挤缝技术，即用橄榄树脂和棕榈丝混合在一起制成膏状，凿入船板缝中防漏。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中就记载有这一技术的应用。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则记有北海是橄榄脂的重要出口地，橄榄脂的应用是综合利用，是符合经济效益的。而《壮族通史》则认为，包括合浦在内的壮族造船技术在当时居于领先地位，马援平息了交趾征侧叛乱后，率部北返时也把合浦的造船技术带回了中原。

唐宋年间，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中心转移到了广州，但并没有因此影响到合浦造船业的发展。相反，作为交（州）广（州）海路，邕（州）交（州）通道，廉梧（州）水路，灵（渠）合（浦）通路的出海汇合地，在中原与南洋（东南亚）的交通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门户和桥头堡作用，造船业的发展方兴未艾。船舶建造也向大规模转向，船的种类也趋向多样化，有江河中行驶的刳舟，有“越大海商贩皆用之”的藤舟，还有一种“木兰舟”。据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描述，这种木兰舟“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能够造出这样的大船，可见当时合浦造船业实力强大。元世祖为了加快征讨交趾的进程，在建立元王朝 15 年时，即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 年）二月“命湖广行省造征交趾海船三百，其以八月会钦、廉州”（见《元史·世祖纪》）。湖广行省（行省中书是廉州路总管伯颜兼）又把这一任务交给了

廉州。在半年时间内赶造出三百艘渡海作战的战舰，没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力量，是在单靠人工劳作的一千多年前是难以想象，合浦造船业在当时不但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也具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

明代是合浦采珠业最为发达，也是最狂滥的时期。明嘉靖年间两广总督林富及其子廉州太守林兆珂在记述当时滥征狂采珍珠时提到，明弘治在廉州府大采珠，共动用的船舶达 600 多艘，被风浪打坏的采珠船只 76 艘，如此大规模的采珠船舶大集结，必须要有强大的造船业来支持。根据明代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中记载的为了适应合浦采珠作业的需要，当时还对采珠船进行了技术工艺改良，叫做“竹筐沉底”。这种工艺是“以铁为耩，最后木柱板口，两角坠石，用麻绳作兜如囊状。绳系船两旁，乘风扬帆而兜取之”。用“竹筐沉底”工艺改装后的采珠船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没水采珠”作业，为人身安全作业提供了保障。

清代的造船业由于受到清王朝“禁海迁界”的限制，禁造载重 500 石以上的大船，但造船业并没有因此萎缩，而是化整为零，从地角至党江一带大小船厂星罗棋布。成百上千艘小型船舶罗列海岸，甚为壮观。《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 年）中称北海（时属合浦，下同）本土渔业船队至少有 500 艘，而当时的北海海关英国税务司官员则称北海造船业的发展状况“会使任何一位欧美的快艇制造商感动振奋。”清道光、咸丰年间，一种叫做“头艏”的大船进入北海，北海兴起了制造“头艏热”。这种头艏可载重 300 吨，最高时速可达 9 海里，头艏迅速成为北海造船业的拳头产品。民国八年（1919 年），北海商家发起建造机帆船，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购买外国柴油机，在高德建成了北海第一艘机帆船，这是合浦

的造船业从古代传统制造进入现代科技发展的标志。

合浦盐业的发展，不但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朝廷税收的重要来源，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商品贸易中为数不多的，由政府掌控的“专卖”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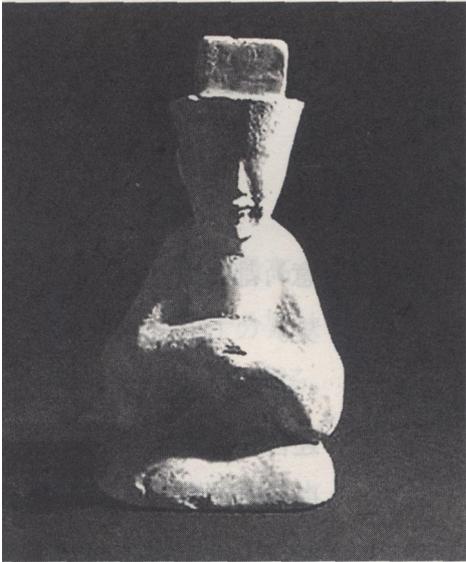


图 9-11

汉墓出土的陶俑。

合浦郡范围内曾设有盐田郡这个行政区域，时间是在南北朝南齐年间（479-502年），至于盐田郡治址在何方？《壮族通史》的考证是在今北海区东南。而民国版《合浦县志》则称，是因为南齐年间，合浦一带便有了煮海水制盐的生产。因此设盐田郡，管理盐民，征收盐税。《大清一统志》的注释是：盐田郡疑即五代的盐场县，在今合浦东南界。从上述引证中可知，起码在南北朝时期，合浦的盐业生产就有了一定的规模，不然的话，朝廷不会专设盐田郡。同时，也证明今北海市区内设盐田郡的记录是准确的。古代以特产设置行政区是常见的，如合浦在三国时曾设珠官县，唐代增设珠池县，南汉时曾设媚川都，取“水怀珠而川媚”之意），都是以特产

定区域名，盐田郡的设置，见证了合浦古代产盐的历史。

宋代曾任钦州教授的周去非在《岭外代劄》一书中，有一段话是描述合浦盐业生产及经营状况的：“今日广右漕计，在盐而已。盐场滨海，以舟运于廉石康仓。客贩西盐者，自廉州陆运至郁林州，而后可以舟运。”“官以牛东自廉州石康仓运盐贮之，庶一水可散于诸州。凡请盐之州，曰静江府、融、宜、邕、宾、横、柳、象、贵、郁林、昭、贺、梧、浔、容州，各以岁额来请。”从上述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合浦生产的海盐有两种运输方式：一是民间的，用人工挑抬走陆路到郁林州（州治在今贵港，古称布山），很明显，这是带有走私性质的，因此书中记述“商人犯艰之”。二是官方专卖，先运到石康盐仓，然后“庶一水可散诸州”，这是水运。诸州即上述16个州，从这16州“各以岁额来请”的情况来看，当时的专卖程度已经非常规范。

为控制海盐走私，唐以后制定了严厉的垄断措施，唐乾元六年(758)，专门设置了岭南巡院来“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可见官府对海盐专卖控制之严厉。

宋代，朝廷对合浦海盐生产经营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规定合浦每年产盐3万石，以每石110市斤计，年产达1650吨，这是相当大的生产规模了。这1650吨海盐要供应广西的19个州，而北宋时广西只有廉州府的白石和石康两个盐场。建炎年间(1127-1130年)，朝廷在廉州大量征集税盐买马，在这几年间，最高一年的征调廉盐200万斤专卖，用以卖马1500匹。在海盐供应十分紧缺的情况下，绍兴七年(1137年)，时属廉州府辖的钦州新开了白皮盐场。到了绍兴三十年(1160年)，

廉州府“每岁纳盐货”已达 3000 吨。有必要说明的是，这 3000 吨是指令性计划，必须按时纳贡的。元明年间，基本沿袭了宋代的盐业制度，但因为战争频起，合浦的盐业生产受到破坏，盐田残损，产盐量低，盐贵奇缺，导致以海盐为供应源的 19 州中，经常出现了民不敢食盐、“十户九淡”的状况。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清代才逐渐得到恢复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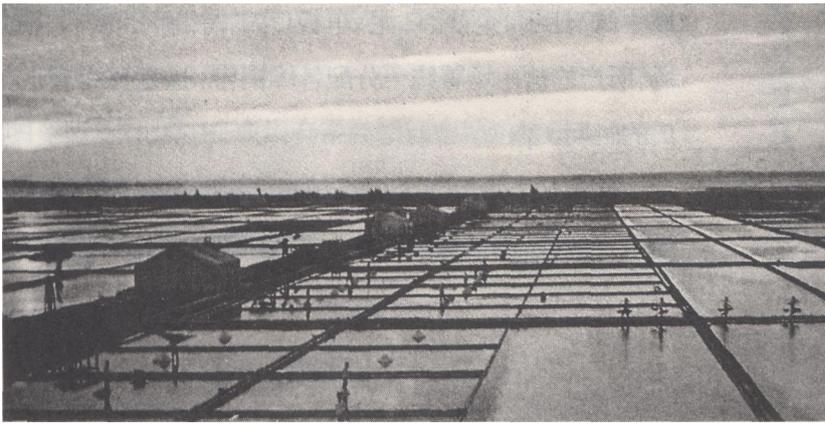


图 9-12

合浦的盐田。合浦自宋至清，都是朝廷盐业专卖控制的地区。

清康熙十九年（1680 年），朝廷将白沙、白皮、白石三个盐场合并成立了白石场盐场。白石场盐场的辖区包括今北海、钦州、防城海域的生产区。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因为白石场辖区太广阔，朝廷又将之分为白石东场（合浦），白石西场（钦、防）两个盐场。乾隆三十九年，两盐场的产量达 2865 吨，基本上恢复到宋代的产量，但此时广西人口剧增，海盐由宋代的基本自给（时每人每年消费量达 2800 克），到了乾隆年间，合浦海盐的年产量 2865 吨，而年需求量却达 17910 吨，自给率仅为 16.67%。合浦的海盐专卖局面愈加严峻，成为朝廷重点控制的特供产品，相关的措施制度也严厉近乎苛刻。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九月，清廷给两广总督下了一道诏令：“以高

州、廉州盐田已恢复，准南宁、太平、思恩三府食廉盐。”这是合浦地所产海盐“廉盐”专称的缘故。雍正二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朱批：“经高、廉二府私盐充斥，知府不能兼管，添设两广运使司运判官一员。”这个司运判官秩六品，驻合浦，级别比县太爷还高。乾隆元年（1736）清廷又规定：盐场附近贫苦百姓，年过50及15岁以下，无人供养者，准许可证每人每日卖盐50斤易米度日，但不得出盐场所在县界。乾隆十年（1745年），朝廷专门制订了两广盐法八条。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合浦设立了白石场盐署。到了道光、嘉庆两朝，对廉盐生产控制更严，多次行文严惩私盐，确保廉盐进入湖南市场。民国初年，合、钦、灵、防的所有盐场并入合浦白石场署统一管理，计有沙岗、竹林、公馆、平山、石头埠、犀牛脚、江平、企沙、乌泥、车板（今广东廉江境内）、榄子根等12个盐场，所产的盐由场署统一分配各埠销售。这是合浦盐业产区管辖范围最广的时期。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朝廷指令户部成立了盐埠公局，规定各盐场所产的盐，由盐埠公局统一支配，同时划定了各海盐销售的区域，不得相互交流，合浦所产的海盐沿袭称为“廉盐”，廉盐销售的范围、包装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各级官府不得逾权，违者严惩。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规定每包盐150市斤，各地的盐价统一由朝廷确定。合浦埠每小包1.7093两，河池埠每小包5.2617两。道光六年（1826年），因私盐冲击，官盐积滞，影响岁入，朝廷开展了打击私盐的大整治，在广西、江苏、广东等沿海9个州府统一行动。第二年，又把合浦廉盐改为每包50市斤，并规定任何人不得擅自改变包装重量。

合浦除了盐业生产之外，其他产业发展也较早，织造业就是其中之一。

合浦是海上丝路始发港所在地，古代丝绸贸易带动了当地丝绸业的发展，合浦丝绸的生产贸易在史书中屡有记载。《岭南代劄》记述：“雷、化、廉州有织匹，幅长阔而洁白细密者，名曰慢吉贝。幅粗疏而色暗者，名曰粗吉贝，有绝细而轻软洁白，服之且耐久者。”这些被叫作慢吉贝的丝织物“间以五彩，异纹炳然”、“五色鲜艳”，又被称为“朝霞吉贝是也”。宋代合浦丝绸的生产贸易盛况，在宋人的笔记小说中，还记载有外方使者来到廉州时，以自产的丝绸赠与廉州友人。得到了廉州友人回赠的中国丝织物后，“皆拆取色丝，而自织衫”。

在明《正德明令典》中记载中，廉州府要向朝廷定期定量进贡棉花、土绢、葛布、麻布和络布，种植桑树的指标是10000株以上。

光绪十五年（1889年），清政府在两广大力推广蚕桑种养，并由官府广泛印发《蚕桑辑要》和《种桑育蚕谱》等书，多方购置养蚕器具及缫机发放到州县，还施行了免税政策，廉州府成为重点示范地区之一。在朝廷的大力推广下，廉州丝绸产品出口又创新高，当年出口生丝5400余斤，得到朝廷的专门奖励。据史料记载，为了鼓励乡民大种其桑，大养其蚕，官府还编制《种桑歌》到处传唱。

烟草业的发展也是其中之一。古代珠乡烟草业的生产经营不但时间早，规模大，而且还有独特之处。

早在清末民初，合浦的烟草业就成为一个主导产业，仅廉州市区埠民街一带就有烟铺30多家。这些经营烟草的商铺成了当时廉州城内的首富之家，如南华、绍泰等商号，都是因为经营烟草产品而富甲一方，当地民谣有云：再有钱也富不过绍泰，屋再大也大不过南华，由此可见烟草业发展

的状况。

古时廉州烟草业的生产经营以烟丝生切为主，这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水烟筒”的需要。所谓生切，是指烟叶经晒制后直接切丝包装出售。这种烟丝味较重，一般是烟瘾较重的人使用。熟烟则切丝后再回炉烤焙，这种烟丝味醇香，适合一般烟民使用。厂家为了吸引烟民，有时还在烟丝中加进某些香料，称之为“顶熟”。

到了民国之后，珠乡的烟草生产和经营有了新发展，有些大的商铺如绍泰、永泰、南华等，开始引进机械设备生产卷烟。开始时是用木制卷烟机，生产的卷烟品牌有万花牌、标准牌、老头牌和长城牌。其中以永泰烟铺的规模最大，该商铺拥有近60台木制烟机，最高日产量达500条（每条十包），可以算得上是龙头企业了。当时廉州城内的烟铺月总产量达60000斤，产品销往钦州、防城、上思、海南岛、百色等地，廉州因此成为烟草产品的集散中心。



图 9-13

合浦民间常见的碾布石，织布机架，可见证合浦纺织业的发展状况。

烟草不是合浦本地原产作物，是从美洲移植过来的。合浦从什么时候起本土开始有烟草种植业，缺乏详细的史料考证，一直是一个待解的课题。

直到1980年底，文物部门在对合浦上窑遗址进行发掘考古时，挖掘发现了3件陶瓷烟斗（图9-10为其中之一），烟斗背后有“嘉靖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造”的铭文，证明合浦在明代就有大量烟草种植了。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种植烟草是在明嘉靖年间（1522-1566），是从海外首先传入合浦沿海地区之后，再传至广西各地。合浦上窑考古发现的瓷烟斗，已被证实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烟斗实物。

在合浦上窑发现的这3件瓷烟斗呈深黄色，形状不一，风格各异。烟嘴和烟径为曲尺状，制作工艺较粗糙，估计是为供给当地普通烟民使用的，因为有钱人家是用玉制的烟斗。而且3件瓷烟斗的比例也不相同，显然是为了满足不同年龄的烟民而设计的，显现当时的烟民数量已相当庞大了。从瓷烟斗到卷烟生产，印证了合浦烟草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珠乡先辈的创造能力和包容开放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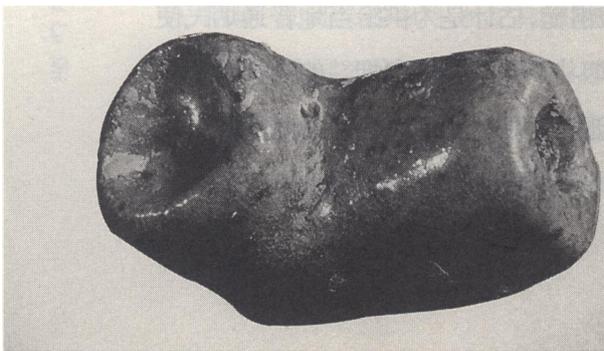


图9-14

合浦出土的明代陶瓷烟斗见证比中原种植烟草的年代早了几十年，可见证烟草种植从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传入中国的历史。

合浦自古是媚川育珠之地，地灵人杰，汉代多有名士风流佳话，如众口皆碑的“珠还合浦”的孟尝、“廉州留名”的费贻、“铜柱封疆”的马援

等，都是史书典故人物。除此之外，汉代合浦名士还大有人在，虽然他们的名气不如孟尝、费贻、马援3位先贤那样，他们的事迹能载史册。

姚文式 合浦人，史称其“雅好诵读，博通古今”。东汉末建安中(201-211)因才学出众被举荐为茂才，尔后官至交州治中，这是刺史府中一个属官。姚文式随交州刺史步骘到南海巡视。初到南海时，步骘登上山冈，遍览地形后，感叹地说，南海土地丰腴，无怪乎南越王赵佗选择这里作都城了。随即又问同行的属员，有谁知道当年赵佗的都城在什么地方。同行的属员没有人能回答，只有姚文式从容答道，“秦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危，召龙川县令赵佗委以兵权，任嚣病卒后，赵佗自任南海尉，起兵占据岭南三郡，设南越国，并在番禺建都城，方向即在今州城东北三十里处，哪里还建有一个朝台，表示归汉后朝拜汉王的意思。”步骘听了姚文式的回答后，派人去搜寻，果如姚文式所言，于是就在赵佗南越古都原址“遂直城廓，以建州治，绥和百粤”。这就是广州城初建时的一段佳话。史书因此誉称为“文式之功也”。即是说，广州城能在南越王故址建成，是姚文式的功劳最大。

张重 字仲笃。史称其“笃学善言，为岭表望士”。即是说，张重是一个好学之士，且又才思敏捷，善于辩论，是岭南一带的知名人士。当时由交州刺史推荐，在日南太守府中做一名文书之类的属官。有一次，张重写了一份奏章送到洛阳王宫，汉明帝见张重身材矮小，于是就开玩笑说：“你是那个郡的小吏呀？”张重听了之后大声说：“我是日南郡官吏，不是小吏，皇帝用人是量才而用呢，还是按他的骨肉重量来使用？”汉明帝听了，心中暗自称许张重的善辩口才。

第二天上朝，汉明帝与群臣议论完朝政之后，想起了张重的善辩，于是又问张重：“你们日南郡的人，都是向北边看太阳的吗？”张重马上回答：“大汉朝有雁门郡，也有金城郡。但雁门并不是把大雁堆起来作城门，金城也不是用金砖砌城墙。只是地名方位而已。臣居住在日南，也是一个地名，并不是在太阳的南边，也不用向北边看太阳呀！”汉明帝听了张重的回答之后，更加赞许他的才思敏捷，赐给他大量的财宝。自此之后，每逢有什么疑难答辩之事，汉明帝都会召张重上殿应对，对张重的才能多加倚重。

尹牙 是凭自己的才能从下级官吏做起，一直升至郡主簿。汉代郡的主簿参与郡机要事务，总领府事，相当于一郡的副职也即是太守的助手。尹牙在任期间，深得太守的信任倚重，府衙有什么重大事务都全权委托尹牙处理，尹牙因此对太守常存有感恩之心。一天，尹牙见太守在府中悲叹，于是就问：“太守你如何悲叹，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事解不开心结呢？”太守告诉尹牙，自己的父亲被朝中权奸张太尉迫害致死，杀父之仇未报，因此惭愧悲伤。尹牙听了之后，征得太守同意，穿起佣人衣服，去张太尉府中应征当个杂役，经过3年的潜伏待机，终于杀了张太尉，并将张太尉的首级取下，回报太守，但尹牙依然被捕入狱待斩。尹牙忠勇报恩之事传到皇帝那里，皇帝为尹牙的忠勇而感动，于是赦免了他的死罪。

李祖仁 因他的品行高尚，郡人将他居所近的江名为慈廉江。

丁茂 则因善孝行而被郡中吏民敬重。他为母亲守孝筑坟，坟台四周有白鹿陪伴左右成为千古美谈。

孟尝 一代名臣，“珠还合浦”的典故就是因他而名扬四海，千古传承。

孟尝是浙江会稽人。他的仕途是凭实力一步一步升迁至合浦太守的。

他由科举茂才出道，做过县令，是经推荐考核才当上合浦太守的。

孟尝少年时便显露出过人的才能。同乡有一寡妇至孝，侍奉姑婆过世之后，被小叔诬陷入狱。而县官又不加细察，偏听偏信，寡妇竟被判死刑。孟尝为之申冤至太守衙门，寡妇终得平反。此事在乡间传为美谈，由此亦见孟尝胆识。

孟尝后经州郡考核推荐，由县令直接升任合浦太守。在任期间，因廉洁勤政，革易前弊，去珠复还，遂有“珠还合浦”这一千古传奇典故。

据《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述，孟尝回乡后“隐处穷泽，身自耕佣。领县土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从这段记述可知，孟尝“被征当还”后，隐居在偏僻的山泽之地，开荒垦地，自食其力。他是在太守任上病辞“被征当还”的，却连基本的养老保障也没有，这是不正常的。更有意思的是，领县的士民敬慕孟尝的道德风尚，数百人迁来与之为邻，使得一阶荒野山泽成了“就居止者百余家”的村庄。如此高风亮节的一代名臣，却不被朝廷启用，这更是不正常的。

孟尝有一个同乡名叫杨乔，当时在朝廷中担任尚书之职，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府部长。杨乔对孟尝所遭受的待遇深感不平，为此，他先后7次向汉桓帝上书，请求恢复孟尝的职务。但是，始终都不被采纳，孟尝依然过着隐居农耕生活。

杨乔也是一个骨气之士，忠直良臣。于是他愤而再次上书给桓帝，为孟尝申述，奏章中说：

尊贵的皇帝，我今天不惜冒犯天颜，再次向您推荐原合浦太守孟尝，虽然预料到这次也是徒然的，但我还是要说的。

孟尝仁义凛然，品格出众，清行出俗，能干绝群，在合浦为政期间，使得去珠复还，当地的老百姓奉他为神明，设祠拜祭。他在太守任上，合浦珍珠完全由他掌握，积聚财产易如反掌，但他却能只身一人抱病回乡，洁身自好，至今靠开荒种田过日子。这样的忠臣得不到任用，就像珍珠被弃之于草莽之中，朝廷的宝物被掉进臭水沟。我对此甚是感到伤心欲绝啊！如果像孟尝这样贤臣忠良都得不到皇帝您的任用，我却能伴随在君王身边，真使我万分羞愧！这种用人现状不改变，只能令忠贞之士远离朝廷，到时，皇帝您身边的不都是一些用鸟毛装扮成凤凰，用假珠来当作上品珍珠，用油漆涂过的朽木之辈吗？我先后七次向您推荐孟尝，并不是因为我与孟尝的同乡关系，而是为了向朝廷推荐人才，树立起良好的用人风尚啊。请皇帝看在孟尝祖宗三代都是为国牺牲的忠臣之家，他本人也有“去珠复还”的美德政绩，恢复孟尝的官职，让他为朝廷争取更多的民心，建树更多的功德吧！



图 9-15

廉州古城内的汉甘露井，清代改名廉泉。

然而，桓帝听任宦官乱政，自己却沉湎于声色美酒，不理政事，奏章多为阉臣把持，杨乔的劝谏自然也呈不到桓帝的面前。直到孟尝 70 岁病逝于隐居地，始终都得不到启用。杨乔则因为不肯做桓帝的驸马而绝食自杀。

苏东坡 宋元符三年（1100 年）一月，宋哲宗驾崩，宋徽宗继位，诏令大赦天下。苏东坡时在天涯海角的海南岛任琼州别驾（州长官的佐吏，也称通判，正六品），当他接到大赦令量移廉州（移是古代官员调任的一种程序，即到某地等候任用，“量移廉州”即到廉州等候任用）时，已是 5 月底 6 月初了。在惊喜悲欢之余，他挥笔写下了《移廉州谢表》（下称“谢表”）一文以表达他的心境。

“谢表”是用骈体文写成，颇具“赋”的格调。全篇用了大量修辞的手法，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作者思想情感的同时，犹显作者的作文功力（苏东坡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使读者从中体会到如同开闸泄洪般的悲欢离合。“使命远临，初闻丧胆，诏词不达意温厚，顿返惊魂”，仅 16 个字，写尽了苏东坡悲喜跌宕的心境。他为什么听到了使臣来到的消息，会“初闻丧胆”呢？原来，苏东坡在海南谪居，正是他宦途生涯中的第 6 次贬斥，每一次贬斥都将他驱向更偏僻的地方。此时是身在天涯海角的海南儋耳，再有皇命无处可避，心疑只有杀身之祸，这就是苏东坡“初闻丧胆”的原因。

苏东坡 1100 年农历 5 月 24 日横渡琼州海峡，经廉江，6 月 19 日才到廉州。在廉州的日子里，是苏东坡人生最后的快乐时光，他在珠乡人民热情好客的氛围中度过了 2 个多月，和珠乡士一一一起欢度中秋节，写下了称赞廉州龙眼、合浦月饼等多篇诗文，还在游览海角亭时即兴挥笔书写“万

里瞻天”4字。后人多以为这是苏东坡盛赞海角亭的海天一色美景，其实读了《移廉州谢表》之后，方可顿然洞察苏东坡书写了“万里瞻天”的情怀，原来，他老人家心中的“天”就是“遥瞻日月之光”中的“天子”皇帝。这才是《移廉州谢表》留给后人对“万里瞻天”真实注解。

公元1100年农历六月，苏东坡获赦北归，从海南儋州起程至廉州的途中，他先后写下了《移廉州谢表》、《书合浦舟行》、《与秦少游书》等文，表达了获赦的心情和北归的向往。久经磨难的一代文宗，在这些文章中慨叹：“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书合浦舟行》）。从中看出，珠乡廉州在苏东坡的心中，是一个吉祥福地。

路博德（西汉）西河平州人。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时为卫尉的路博德被任命为伏波将军，率领楼船将军等出兵南越征讨南越宰相吕嘉的造反，经过一年多的战斗，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冬平定了叛乱，统一了岭南。汉武帝以岭南地划合浦、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交趾、九真、日南九郡。据史书记载：路博德不但行军布阵作战勇敢机智，且又爱护士兵，体恤民众。因此岭南“越索闻伏波名”、“城皆降伏波”。路博德在合浦汉武立郡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费贻（东汉）南安人，西汉末年，王莽专权，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时公孙述据四川为王，闻费贻贤名，多次请之出山相助。费贻不愿为割据势力卖力，于是跑到深山隐居。公孙述派人跟踪邀请，费贻就把漆树汁涂在自己身上，使皮肤过敏感染成癞渣状，还披发佯逛逃避。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立即去请费贻出山，并任命他为合浦太守。费贻任合浦太守期间，勤政有为，爱民廉洁，他把中原的农耕技术带到合浦，亲自教合

浦民众耕种，修渠筑坝蓄水，并和老百姓在一起耕田建屋，同吃同住，得到了民众的爱戴和拥护。费贻离任赴京之日，合浦士民不忍让其离去，扶辇百里相送至一山下，才依依不舍泣别分手。费贻离开合浦后，民众为纪念他治理、开发合浦的功德，便把泣别分手的大山取名为“廉山”，把所在的田垌称为大廉垌，把合浦江（汉时又称“瘴江”，明代称为西门江）改名为廉江，把费贻在合浦带领民众所挖的井称廉泉（今合浦县城体育场内，汉时称甘露井）。唐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因合浦境内有廉山、廉江，便将合浦郡改为廉州，取意为“弘扬廉洁勤政吏治之风”。

薛综（三国） 沛郡竹邑人。少年时便跟着族中亲人避战乱来到交州定居。曾官至五宫中郎将，黄龙三年（231）任合浦太守，期间参与平定交州叛乱和征讨海南（珠崖、儋耳）作乱等重大战事，为稳定边疆、开发建设合浦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他还敢于直言吏治制度上的弊端和对官员的腐败行为提出抨击。三国三足鼎立之际，岭南一带是吴、魏激烈争夺的地方，鹤蚌相争几年间，孙吴与司马炎为争夺地盘，在合浦发起了4次大战役，周边的太守、长吏等趁乱“多自放恣，故数反违法”、“侵虐百姓，强赋于民”，“黄鱼一枚收稻一斛”，致使“百姓怨叛”、“流离丧亡”，薛综对此直言上书吴王孙权，请求采取严厉措施整肃吏治，以防止“群恶日滋，久远成害”，得到孙权的赞赏和支持，有效地压抑了贪官污吏对民间的掠夺。薛综由于治理合浦有功，于赤乌三年（234年）升任尚书，赤乌五年（236年）兼任太子少傅，第二年春病卒任上。

陶璜（晋） 字世英，丹阳秣陵人。在东吴孙皓据有交州合浦时，曾任苍梧太守，期间因与司马炎军队相争兵败而退保合浦后，陶璜从合浦海

路出师收复了被九真太守董元占领的交趾（今越南），陶璜被任命为交州刺史。陶璜在合浦期间，关心珠民生活，体恤盐工艰苦，史书称其“周穷好施，能得人心”，接着又以合浦为基地发动攻势收复被司马炎军队占领的失地。孙皓欲升陶璜为武昌都督，但交州、合浦一带的“士民请留璜以千数，于是遣还”，即是说千多士民拦住陶璜不让他上任武昌都督，孙皓只好让陶璜留任交州（合浦郡属交州地辖）。280年，吴后主孙皓投降了司马炎，孙皓手书陶璜归晋。司马炎仍然留用陶璜，在交州任职，并封宛陵侯、冠军将军。陶璜向司马炎上书，反映“合浦郡土地硠确，无有田农，百姓难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换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为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建议晋武帝司马炎对合浦开放珠禁，让商旅往来，使珠民能够以珠换取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解决饥困。司马炎听从了陶璜的建议，开放合浦珠禁，使合浦珠市得以恢复，珠民有所营生。陶璜在交州、合浦先后30年，“威恩著于珠俗。及卒，举州号哭，如丧慈亲”。

苏緘（宋）字宜甫，晋江人。以进士第入仕，以战功任库都监，熙宁初年（1069-1076年）任廉州知府。八年任邕州知府，因守城拒乱携全家36口共赴死难，悲壮至极。宋良神宗亲自为之悼念并追赠奉国军节度使、谥号忠勇。

危祐（宋）元祐元年（1086年）任廉州太守。他在廉州太守任上清廉勤政，带领民众修建廉州城墙，廉州堀池由是始成。廉州吏民见危祐日夜辛劳，便主动集款请工匠打造一把扇柄上镶有珍珠的聚珠扇送给他。危祐对送礼者说：“我在廉州当太守，却在百姓面前摇着这把镶着珍珠的扇，这不是使我个人愧对廉州的名称，愧对廉州的百姓吗？我在廉州当太守，

就要牢记廉州名称的来历，只有爱惜百姓，才能对得起先贤，对得起廉州百姓的期望，又怎能以聚珠扇炫耀而忘了自己的职责呢？”危祐说完之后，把聚珠扇退还献扇者。危祐在廉州太守任上，坚持“名与是州符”成为千古美谈。

有“名著南天”之誉宋高宗时的廉州通判张夔也是著名的廉吏良臣。他在廉州为官期间，廉州生产沉香、黄金，张夔负责监管这些事务的经营，他却始终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政声卓著，分毫不取。他还深入到民间，劝农垦耕，史称“一时治境安宁，人民安居乐业”。高宗皇帝曾将他的名字书写在屏风上，并赐“名著南天”匾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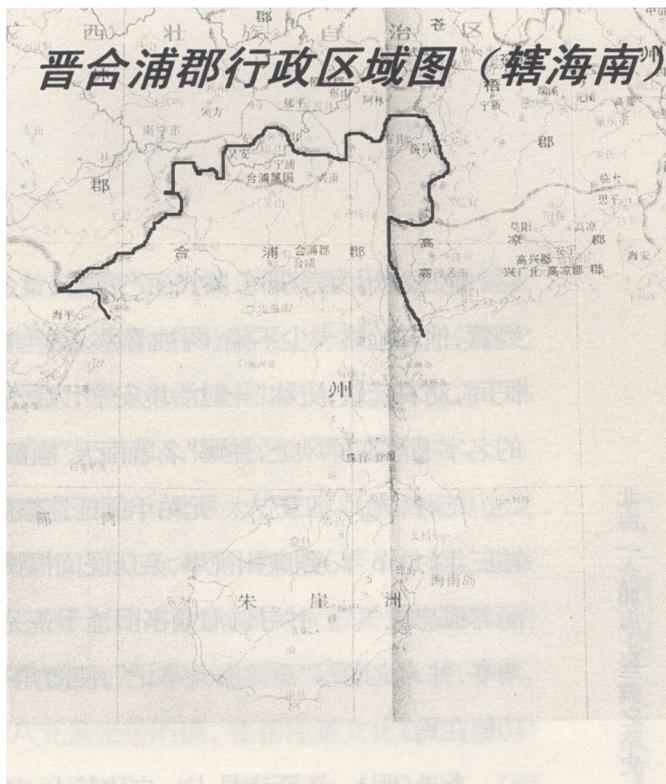


图 9-16

晋合浦郡行政区域图。

范梈（元）江苏人。元祐年间任监察廉访吏，巡察岭南吏治，于元祐三年（1316年）到廉州视事，亲历民间探访吏治，主张“驱去流俗之态，

涵养孤忠之气”。并寻访海角亭旧址于荒芜乱水之间，嘱咐郡吏重修海角亭，并为之题写“重建海角亭记”，使海角亭得以重见天日，传续后世，功德在焉。

李逊（明）江西南昌人。史称其人一生不畏权贵，刚直不阿，景泰五年（1454年）任廉州太守。时值朝廷滥采合浦珍珠之际，派太监驻合浦珠池逼采珍珠。监采太监谭纪为中饱私囊而仗势贪赃枉法，欺诈掠夺民间珠宝，不择手段驱赶珠民到深海采珠，导致了“十万壮丁半生死”、“以人易珠”的惨剧。李逊与谭纪力争，并上书朝廷指出谭纪逗采珍珠的恶行。后遭谭纪诬告李逊聚众谋反，将李逊逮捕入狱。李逊在狱中仍然坚持揭露谭纪残害珠民的罪恶，为明代宗朱祁钰获知，便下旨将谭纪收监，为李逊平反，复任廉州太守。李逊为民请命，不惜以身犯险，忠直爱民的品德被后世代代敬仰。李逊调离廉州后，百姓为他立祠祀之，李逊在廉州任上，重建还珠亭。

林富（明）嘉靖初任两广总督。目睹合浦珠民采珠之艰险及珠池太监逼采的苛刻，先后两次上书嘉靖皇帝，要求停止滥采珍珠，撤销太监监守珠池的弊制，开放珠池让百姓自由采珠谋生。林富以两广总督之高位敢为廉州珠民犯颜请命，廉州民众为之建祠以作纪念。林富之子林兆珂后来也任廉州知府，他继承先父清风，体恤民情，为珠民请命。

张岳 明嘉靖十四年任廉州知府，是最为史家称颂的清廉良臣之一。他在廉州知府任上励精吏治，以仁为本，除暴安良，严于法制。他察访民情，引导农民开荒拓地，兴修水利，引进桔槔运水方式，教珠民改用吊桶汲水、车戽浇田，促进了农业生产，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史书称，时廉

州府的水利设施，十有八九是张岳所建。张岳注重文化教育、“改学宫、立课程”在廉州府城新建了县学宫一座，施行教化，大振士风。《明史》记载张岳，“居廉四年，未入一珠”。他离开廉州府前，家人向他提出请求，想见一见合浦珍珠，他才向府库借出珍珠让家人看了之后，当即归还府库。由于他的清廉勤政，张岳离开廉州后，廉州民众为之建“张岳公生祠”以纪念他。张岳有一句为官名言：“用民一钱，如针刺吾体血，吾不忍也。”由此体现出廉山吏风的高风亮节。

康基田（清）号茂园，山西兴县人。进士出身，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任廉州知府。康基田是史载在廉州建树最多的清廉勤政地方长官之一，康基田在任廉州知府期间，一个重要的政绩就是敢大刀阔斧地整治吏治之风，对那些“暴横为民蠹”的官员，“列其罪状、惩其首恶”。他还亲率城中军民修建排水工程，到农村去访贫问苦，兴修水利，其在任上扩建了古卫民圩（今廉州东圩），建商铺百多间，让老百姓开展商贸为业。在全廉州府推广蚕桑种养，鼓励农民学习抽丝织布，还大量印发种养蚕桑书刊，教导农民学习新技术。他扩建了海门书院，设立奖学机制，还捐款重建文昌塔、东坡亭、东坡塘，在重建东坡亭和东坡塘工程中，发掘了已被埋没的东坡井，使之得以重见天日，传世至今。康基田还主动裁减自己的俸禄来作海门书院的办学经费。康基田治理廉州期间，史称“农桑负盐之利，甲於他郡”、“岭外诸郡之莞枢”、“东南富繁之地”，对康基田的评价是“政清刑简，爱民礼士、体察民情、清风惠政，人所乐道”。去任之时，城中吏民倾城相送，攀辕百里随行。

合浦的历史人文史迹在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社会经济发

展、文化积淀长河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图 9-17

合浦汉墓出土的稻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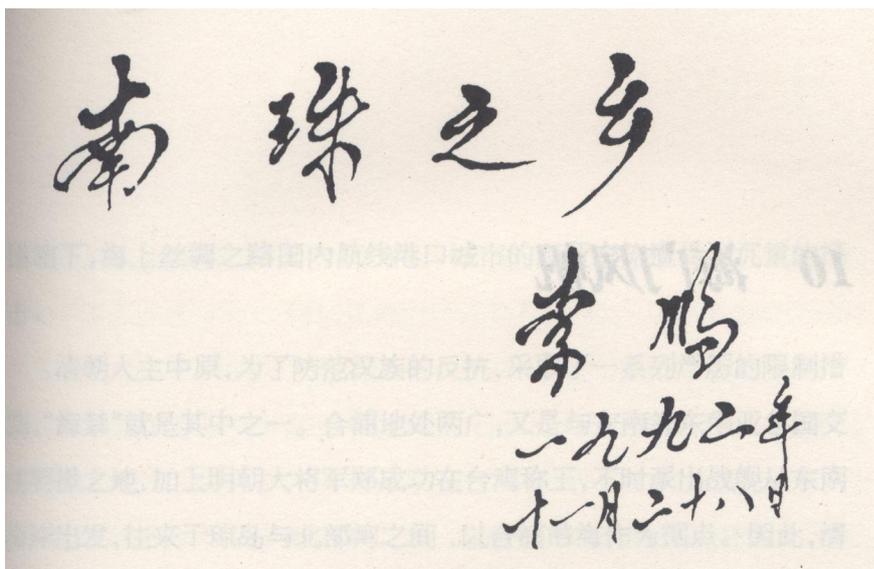


图 9-18

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为合浦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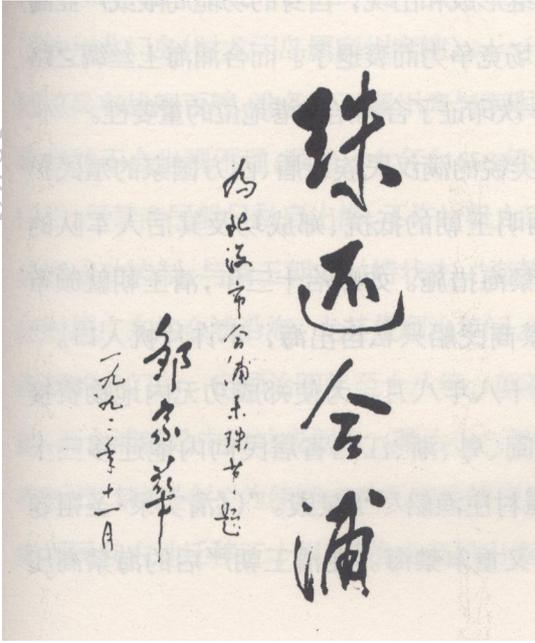


图 9-19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为合浦题词。